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第五辑）

中国图书馆学会 编

王余光 霍瑞娟 李东来 总主编

中国藏书的历史与传统

主 编 毛 旭 凌冬梅
副主编 郑闯辉 聂凌睿 蔡思明

History and
Tradition of Book
Collection in China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

编委会

主 编 王余光 霍瑞娟 李东来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 | | | | |
|-----|-----|-----|-----|-----|
| 白兴勇 | 毕洪秋 | 陈 亮 | 陈幼华 | 崔 波 |
| 邓咏秋 | 费 巍 | 冯 玲 | 宫昌俊 | 顾玉青 |
| 郭欣萍 | 何官峰 | 侯 艺 | 黄 鹏 | 金德政 |
| 敬 卿 | 李诗苗 | 李世娟 | 李西宁 | 李 歆 |
| 李 雅 | 林肖锦 | 刘淑华 | 吕 梅 | 毛 旭 |
| 缪建新 | 钱 军 | 钱 昆 | 邱冠华 | 屈义华 |
| 沈红梅 | 史胜辉 | 宋兆凯 | 王 波 | 王丽丽 |
| 王新才 | 王以俭 | 王 媛 | 吴 晞 | 肖容梅 |
| 肖佐刚 | 熊 静 | 徐 雁 | 徐益波 | 张 岩 |
| 赵俊玲 | 赵 晓 | 赵元斌 | | |

总序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以下简称“中图学会”）主持编写的丛书“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是中图学会“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的一部分。

自2005年中图学会设立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2009年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来，各类型图书馆逐步重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阅读推广过程中，很多图书馆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没有适合从事阅读推广的馆员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这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能否持续、有效、创新地开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鉴于此，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于2013年7月，在浙江绍兴图书馆举办了“首届全国阅读推广高峰论坛”。这一论坛的目的是为图书馆免费培训阅读推广人，造就一支理念新、专业强、技能高的阅读推广人才队伍。首届论坛获得了图书馆界同人极高的评价。此后，在2014至2015年，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又在常熟、石家庄、镇江、成都、临沂举办了五次免费培训，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绍兴阅读推广人培训之后，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便着手考虑培训的专业化与系统性。为了更好地将阅读推广人培训工作顺利推进，委员会于2014年7月为中图学会制订了《培育阅读推广人行动计划（草案）》。该草案分四个部分：前言、培训课程体系与教材、专家组织、考核与能力证书授予等。关于阅读推广人，“前言”中写道：

“阅读推广人”是具有一定资质，可以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专业与业余人士。

全民阅读、阅读推广，是立足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与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近两年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规范有效开展，培训“阅读推广人”是十分重要与必要的，也是很多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大型企业、宣传部门十分需要的。

中国图书馆学会长期以来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一批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事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研究，他们承担课题或从事教育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进一步开展“阅读推广人”的培训、资格认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作为以促进全民阅读，为读者终身学习提供保障为目标和社会责任的图书馆，应当成为阅读推广人培养与成长的摇篮。

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了更好地帮助图书馆、学校、大型企业、宣传部门等机构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将阅读推广人培训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为了培训工作更好与规范地开展，特制订《培育阅读推广人行动计划》。参加培训的学员，通过一定的考核，中国图书馆学会将授予学员“阅读推广人”资格证书。

2014年12月11日，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举办的“全民阅读推广峰会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启动仪式”在常熟图书馆举行。会上，中图学会正式启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

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中，教材的编写成为首要任务。这套“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是国内首套针对阅读推广人的教材。由于没有相关的参考著作，教材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今后使用过程中，对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编将做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这套教材的问世，对中国阅读推广人的培育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 编委会

前言

众所周知，有关藏书活动的文字，首见于先秦诸子的著述。如《墨子》云“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书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庄子》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韩非子》云“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知者不藏书”“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筐”之类，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文献收藏行为在当时王室贵族及民间私家的实际存在状态。

当代目录学家、史学家来新夏先生（1923—2014年）认为：“一个专用词的固定，必然先有一段事实的发展过程，所以中国的藏书事业应当认为与图书事业并起，也就是说自简书出现，便为藏书事业奠定了基础。大致估算中国的藏书事业，当在两千年以上。”^①这一基本认知，也即本书学术语境的基础。

（一）

“藏”字的本义，是指收存、储藏、隐匿。如《周礼·天官·宰夫》所云，“府”的职责是“掌官契，以治藏”。汉代经学家郑玄（127—200年）释“治藏”之意，即收藏“文书及器物”。而“书”字的本义，是书写、记述，始见于甲骨文。如《周礼·地官·大司徒》所云“六艺”中之“书”字，即指有关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学问。后引申为名词，可指简册、典籍、文书、信函等。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历史著述，是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多体裁文献集，它被后人称为《书》，或《尚书》《书经》。汉代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约58—约147年）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尚书·周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之语云“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典，五帝之书也”，说明殷

^① 来新夏. 书卷多情似故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03.

商王室中收藏有文书和典籍，是为中国古代藏书活动的起源。^①

据《史记·老庄列传》记载，老子（约公元前 571—公元前 471 年）任周王朝“守藏室之史”时，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曾专程西行，前往拜谒，聆听其所论史记旧闻，并得以如愿观览其所守藏的王室珍藏。^②后来他由衷地对弟子们感慨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隋书·经籍志》说：“《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③

周王朝设置“藏室史”，为后世所因循。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藏书家，也正是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曲阜孔氏，由此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藏书世家”。至于孔门弟子，大多成为其时的“读书种子”。

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皇家宫廷藏书、民间私人藏书、学校及书院藏书、佛寺藏书及道观藏书，既各有传承统系，又互相发生影响，共同丰富着古代藏书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殊途而同归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知识积累、文献传承和文化传播。

（二）

自孔子授徒兴学之后，私学开始在民间发展开来。至于战国，墨子、惠施、苏秦、吕不韦等都有私人藏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公元前 213—公元前 212 年，既严令征缴并烧毁流传民间的《诗》《书》及“百家语”等，又在咸阳设计坑杀 460 余名方士和儒生，严重戕害了民间藏书活动。

汉王朝建立后，遂即拨乱反正。公元前 191 年，惠帝刘盈接受张敖（公元前 241—公元前 182 年）之女，其正宫皇后张嫣的劝谏，诏令废除“挟书之律”，于是儒者得以其学行于民间。武帝刘彻当政，更以尊儒崇经为文教国策，广开献书之路，大征民间篇籍，专设写书之官，以增益皇家藏书，至成帝刘骞时，又派遣专员征书民间，于是贵族、世家也设法致力于搜集古书，积聚坟籍之事。

有学者指出，汉代朝廷“通经取仕的政策，官、私学校的兴旺，书肆的出现，

① 刘洵生. 中国藏书起源史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70-71.

② 陈德弟. 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9-10.

③ 隋书·经籍志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5: 11.

所有这些都直接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发展”^①。因而在正史中出现了东汉文学家、学者蔡邕（133—192年）藏书近万卷的记述。据《三国志》记载，蔡邕有书近万卷，至晚年把其中数千卷赠予向来赏识的文学家王粲（177—217年），而由其女儿文姬继承者约为四千卷。

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私家藏书在此700余年间，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藏书家人数愈来愈多，而且家藏万卷者也屡有问世。他们或专门建造藏书处所，或镌刻藏书图章，或编纂藏书目录，继往而开来，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的藏书文化。^②

“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一联，出自宋代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年）为友人郭明甫西斋书房所作七律，他用“十年树木”的古典，隐喻了家有藏书可以助成子弟成才的道理，因此备受后世读书人和藏书家悦纳认同。而在雕版印刷术推广到书籍出版领域以后，江浙一带以至江南一域，私家藏书的人户之多，及其所藏书籍之富，一直居于全国前列。

对于宋明藏书家史实及其特点，20世纪20年代末，现代图书馆学家、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895—1965年）在《图书馆学季刊》上曾发表系列撰文，予以概述。略云：“宋初承五季抢攘之后，书多荡焚”，而民间读书人家则仍有其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书，钞本为多”，“自雕版流行，得书较易，直接影响于私家藏书者亦甚巨。印书之地，以蜀、赣、越、闽为最盛，而宋代私家藏书，亦不出此四中心点之外。印售之书既夥，藏之者亦因之而众。北宋藏书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藏书家多在浙江、福建”；“明初私家藏书，当以诸藩为最富”，自成化年间以至嘉靖、万历以降，“私家藏书，极称一时风尚”；“清代私家藏书之盛，超逸前代……除二三家外，恒再传二散佚，然辗转传播，终不出江南境外者几二百年殆杨至堂得艺芸书舍之经、史佳本，情势始稍变”，“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所独占。考证之学，盛于江南者，盖以此也”。^③

① 陈德弟. 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93.

② 陈德弟. 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③ 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 [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406-426.

纵观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史实，无论是“藏书者之藏书”，还是“读书者之藏书”，^①虽然共同表现出珍爱古书、秘籍盈室的嗜书情意，但两者也有原则上的不同。

所谓“藏书者之藏书”，往往是以觅取和搜集奇书珍籍、典藏和鉴赏古槧秘本为其志趣所尚，成为其独特的生活内容和至高的精神娱乐。他们虽然熟知装帧之雅致、刊印之精善、版本之珍稀，却不再进一步去钻研群书众籍所包孕的有关学问。今人应当全面理解并衷心致敬那些“为藏书而藏书”的藏书家，是他们以一己及私家之力，珍护着艰难搜求到的古书旧籍，并奋力抗拒着或因天灾或因人祸所致的“书厄”，使其中的幸存部分终于传承到了近现代，并因种种机缘，最终成为有关图书馆公益性藏书资源中最珍奇的宝藏，其功其德自堪流芳。

而“读书者之藏书”，则以搜集奇书珍籍、收藏古槧秘本为积累资料的重要方式，而以观书求知、治学著述为目的。其虽与“藏书者之藏书”一样，亦熟知古书旧槧的装帧、刊刻、目录及版本种种，但更有进阶的目标，是通过研讨包孕群籍中的学问，著书而立说。而其著述稿本或刊本，甚或成为新生代藏书家的收藏物。

王韬（1828—1897年）在《征设香海藏书楼序》中说：“夫天下之益人神智，增人见识者，莫如书。内之足以修身养性，外之足以明体达用。是以嗜古力学之士，多欲聚蓄书籍，以资涉览。务博取精，各视其性之所尚。然藏书而不能读书，则与不藏同，读书而不务为有用者，则与不读同。”^②来新夏先生也曾指出：“藏书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现象，不是单纯为收藏和鉴赏而藏，而主要是为读书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也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从读书中撷取精华，形成思想观点，为治学奠定基础。”^③

总之，民间私家的藏书行为与读书求知、治学著述的目的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正是历代藏书家孜孜以求地搜藏，念兹在兹地研读，加强了藏书行为与学问积聚之间的纽带，从而有益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学术史的发展。程千帆、徐有富先生在《校雠广义·典藏编》中指出：“藏书除有益于读书、治学、创作外，也丰富了藏书家的生活内容，使他们获得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许多藏书家都把藏书、读书当作

① 钱曾·读书敏求记[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57.

② 王韬·征设香海藏书楼序[M]//菽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329.

③ 来新夏·藏书·读书·治学[J].津图学刊，2001（1）：37-39.

毕生爱好，从中受到慰藉，获得快乐”。由于私人藏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更富有特色和生命力，为我国及全人类的文化传播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①。

(三)

然则中国历代藏书在 2000 多年间所经历的，却是聚而散、散而聚，甚至旋聚旋散、散而复聚、终归于散的过程。对此史实，隋代牛弘（545—610 年）、明代胡应麟（1551—1602 年），及近现代的祝文白（1884—1968 年）、陈登原（1900—1975 年）等，都曾痛心疾首地发表过有关“书厄”的言论。

话说西汉内宫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却不幸遭遇初始元年（8 年）王莽（公元前 45—23 年）篡汉之乱，及随后赤眉农民军攻克长安后的大肆抢掠，曾经“书积如丘山”的局面，以及由刘向、刘歆父子等整理编校过的珍贵古书旧籍，因此荡然无存。建武元年（25 年），刘秀重建了汉朝，史称“东汉”。于是因动乱而隐匿各地的学问之士，纷纷抱负坟策，会集京师。至章帝时，又“诏求亡佚，购募以金”。永元十三年（101 年），和帝驾临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艺术之士以充其官”，以表重视。至于末年，这批皇家宫廷藏书不幸又遭遇了董卓（？—192 年）及其部将之乱，据《后汉书》称“符策典籍，略无所遗”。西晋末年，其皇宫藏书遭遇了永嘉五年（311 年）之乱，据《旧唐书》称“洛都覆没，靡有子遗”。至梁元帝承圣三年（555 年），因都城江陵被西魏军攻占，元帝命人把宫中所有的古今藏书 14 万卷焚毁。有鉴于此，隋文帝开皇三年（583 年），牛弘在上奏朝廷的《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总揽其事为“五厄”。

牛氏认为，尽管自孔子以来，古代经籍“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前代皇家藏书屡聚屡毁，但“一旦治平，当有兴集”，“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应该“大弘文教，纳俗升平”，“一时载籍，须令达备”，而兴集的方式是“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即“猥发明诏，兼开购赏”，以达成“异典必臻，观阁斯积”的局面。隋文帝采纳牛弘建议，委派了专员负责征集搜讨，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胡应麟评价说：“牛弘之主购书勤矣力矣……隋之书籍所以盛绝古今，奇章力也。”^②

从此在牛弘之后，朝廷颁诏向民间征书、到民间访书，时或成为后世王朝增

①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M]·济南：齐鲁书社，2015：89。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1。

益皇家宫廷藏书的成例。有学者经梳理史料后说：类如唐中宗、睿宗时，选拔京官中有学问造诣者分行各地访求图籍；肃宗时，令各府、县搜访民间图籍，类似举措在唐代发生过九次；至于宋代，则更多达百余次，“朝廷向民间求书、访书、购书次数最多的是宋朝，北宋与南宋共 177 次下诏求书”^①，从而创历代王朝这方面的记录之最。如北宋朝廷征书时，“凡献书者，或支绢，或给钱，或补官，莫不以利诱之。是当时之书，多散在民间也”^②。

然则古代皇家宫廷的藏书厄运，并不止于牛氏所谓“五厄”。有鉴于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之间的改朝换代，胡应麟再续“五厄”云“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鸩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他还特别指出：“古今坟籍之厄，秦固诛首，莽即次之。盖秦所焚，率三代上书，西汉稍稍鸩集，莽又继之，故靡尺简也。”^③

斗转星移，又过去了数百年。1945 年，祝文白鉴于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带着特定的方针和目的来掳掠中国古籍”的事实，又痛心疾首地总结了“李自成之陷北平”“钱氏绛云楼之烈焰”“清高宗之焚书”“咸丰朝之内忧外患”及“民国中日之战役”为“五厄”。^④

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概括我国自古以来典籍散亡的四大原因，是“独夫之专断”“人事之不臧”“兵匪之扰乱”及“藏弄者之鲜克有终”。他认为，古来典籍聚散之故，大抵由于上述“四厄”，“夫四厄之来，为文献之大敌，水火虫害，无时而已；兵燹散佚，时或不免。至于以政治上之好恶而进退其书，于古有之，此后亦未必能免……”^⑤

① 桑良至. 中国藏书文化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66.

② 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 [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406.

③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6-7.

④ 李玉安. 中国图书散佚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33.

⑤ 陈登原. 古今典籍聚散考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3: 16, 544.

武汉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李玉安所著《中国图书散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按照历史时代顺序,对先秦至民国时期图书散佚的历史做了系统叙述,还以专章介绍了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图书,并对历史上的中国图书散佚现象进行了反思。而青岛图书馆研究馆员鲁海(1932—2019年)则曾秉笔直书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建立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藏书作为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受制于经济体制,一个时期‘左’的思想统治精神文明,批判‘私有制’的同时,也使私人藏书未能幸免。许多私人藏书资源或被迫捐献国家,由私藏转为公藏。私人藏书几仅为工作、学习所用之书。在‘十年浩劫’之中更是在劫难逃,私人藏书多数毁于一旦,部分官藏也遭殃及”^①。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东渐日烈的欧美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影响下,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私人藏书活动面临转型。在中华民国初期留洋归来人士掀起的“新图书馆运动”推动下,欧美公共图书馆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且看在20世纪不同年代学人们的共同认识:

1918年,沈祖荣(1883—1976年)在一份有关全国图书馆调查的引言中说:“学校外之教育机关甚多,其性质属于根本的,其效果属于永远的,莫如图书馆。欧美图书馆筹划之精密,设立之普遍,使全国人民之学问技能无一不受成于图书馆,故有‘市民大学’之徽号焉。中国古代藏书,属于公家者,石渠金匱,视若鸿宝,人民无由窥其美富。在私家,蒐罗诸子百家,侈谈宏富,亦只供一二学者研究高深之学理,而于普通人民无与也。盖吾国士(大)夫多持曹仓、邺架之谬见,尚未明了图书馆之性质,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不在考求精神学理,而在普及国民教育。”^②

1927年,李小缘(1899—1959年)在《图书馆学》中批评道:“中国旧式藏书楼,虽书不能藏,遑论用书读书!论私人藏书目的,则为‘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为子孙余荫,家庭世袭,或为好奇赏鉴,甚至玩物丧志”,而“图书馆乃文明国之征

^① 鲁海.古今藏书家比较[G]//天一阁论丛.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382.

^②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G].北京:中华书局,1982:187.

象，观一国图书馆，可以见一国文化之消长……图书馆对于读者之功用，是读书；是以书求得心身之安，及精神上娱乐，与咬文嚼字不同，而图书馆目的，是文化的宣传，及科学常识之普及”^①。

1932年，吴晗（1909—1969年）在《两浙藏书家史略》的序言中说“自板刻兴而私人藏书乃盛……然其弊也在于自私，在于保管之不得当，在于一般民众之无识”“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且其建筑大都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率较私人为精密。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②

1935年，伦明（1875—1944年）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中感慨说“今之人朝聚而夕散者，何其多也；聚而无不散者，何其不期而合也”，“自学校兴而需新书多，需旧书者少；自大图书馆兴，即需旧书者多，而购书者少……书之聚散，公私无别，且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今已萌兆之矣”。^③

1947年，潘光旦先生（1899—1967年）在《南行记感》一文中说：“私家藏书，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前代，原是很好的—种风气，也是不得不有的一种风气。今后的形势显然是不同了。公家图书馆的制度逐渐建立以后，私人藏书的需要，在理论上本应该减少；就抗战前后二三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的环境言之，此种藏书的努力，事实上也确乎无法维持。不能维持，结果就是散，以至于失。既不能维持，而又欲避免散失，惟一的途径是转移到公家图书馆的手里，送赠可，售卖亦可，总以整批转移为原则，否则前途的失不失，纵无从存问，散总是注定了的，而既散之后，要公家图书馆再事搜罗，使散者复归于聚，便又须消耗不知多少的人力物力了。”^④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庆柏曾以近代江苏藏书家为研究对象，总结性地指出了近代公共图书馆兴起对古代私人藏书传统的巨大冲击。他写道：“与私人藏书相比，

① 李小缘. 图书馆学 [M] // 李小缘纪念文集. 南京: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编印, 2007: 3-4.

② 吴晗. 江浙藏书家史略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2.

③ 伦明.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

④ 潘光旦. 见潘光旦. 夔庵随笔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132.

公共图书馆有其突出的优势。首先是购书经费较为正常……可以四出购书，同时也能吸引书贾上门”；“其次，公共图书馆能较多地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如许多人都把藏书寄存或捐赠给图书馆……成为图书馆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三，“私人藏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式的管理，这是与个人的藏书规模相一致的。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具有“管理的规范性”特点；第四，“私人藏书多半是‘自娱’式的，图书馆职员则将其作为自己的一种职业”；第五，“一般情况下，图书馆的馆舍也远比私人藏书楼更宏伟，设备也更齐备”。正是上述种种优势，“使得公共图书馆藏书比私人藏书更具稳定性”。^①

因此，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千年文脉相承、书香不绝的中国藏书文化，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局。

（五）

《中国藏书的历史与传统》与先前列入“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第2辑出版的《中国阅读的历史与传统》（熊静、何官峰著，朝华出版社2017年版），堪为姊妹之篇。

《中国阅读的历史与传统》的著作者是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副研究员熊静博士和西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何官峰博士。全书20余万字，分为八讲。在第一讲的概述之后，依次为《中国阅读史研究进展》《中国古代阅读史的研究资料》《中国古代阅读的历史》《中国古代阅读的传统和精神》《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阅读传统》《古代阅读理论与方法》及《阅读史研究和阅读推广工作》，梳理了中国阅读史的基本研究资料，阐述了历代先贤的阅读变迁，丰富了中国书籍文化史的学术内涵，对于阅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和全民阅读推广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有评论者指出，该书既在宏观层面上回顾了中国阅读史与古代阅读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又在微观层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家庭阅读方法，此外还阐述了我国古代阅读理论与方法同现代阅读推广工作之间的关系。^②

《中国藏书的历史与传统》列入“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第5辑出版。由台州市图书馆馆长兼中国图书馆学会藏书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毛旭研究馆员领

① 江庆柏. 近代江苏藏书研究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22-23.

② 黄育雅. 家风求文雅 书香润华夏——以《中国阅读的历史与传统》为中心 [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9 (4).

衔，并邀约嘉兴学院图书馆凌冬梅副研究馆员共同主编，由嘉兴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郑闯辉馆员、杭州图书馆聂凌睿馆员、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生蔡思明任副主编。全书内容也分为八讲，即《中国藏书文化及其研究概述》《私人藏书与书香世家》《宫廷藏书与官府藏书》《书院藏书与儒学传承》《佛寺藏书与道观藏书》《从古代藏书楼到近现代图书馆》《藏书制度及其技术方法》及《藏书文化的继往与开来》，试图反映中国藏书的基本面貌及其人文内涵的嬗变，评介现当代学者有关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著述成果，以丰富中国书籍文化史的学术内涵。

当今时代，中国内地的全民阅读活动方兴未艾，对于阅读推广人而言，在掌握中国阅读的历史与传统之外，进一步理解和弘扬中国藏书的历史与传统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本书的编写出版，也必将为阅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添砖加瓦，并助推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深化、拓展和创新。

目录

第一讲 中国藏书文化及其研究概述 / 1

- 第一节 藏书、藏书家、藏书文化及中国藏书史 / 1
- 第二节 近代以来“藏书纪事诗”的人文内涵 / 4
- 第三节 历代藏书家的收藏旨趣 / 9
- 第四节 有关中国藏书史主题的专题研讨会 / 18
- 第五节 中国藏书文化史的基本研究成果 / 21

第二讲 私人藏书与书香世家 / 67

- 第一节 私人藏书概述 / 67
- 第二节 私人藏书历史 / 69
- 第三节 历代藏书家举隅 / 78
- 第四节 藏书世家的书香传承 / 89

第三讲 宫廷藏书与官府藏书 / 101

- 第一节 宫廷藏书概述 / 101
- 第二节 宫廷藏书兴衰 / 103
- 第三节 宫廷藏书举隅 / 107
- 第四节 官府藏书概述 / 113
- 第五节 官府藏书举隅 / 114

第四讲 书院藏书与儒学传承 / 117

- 第一节 书院藏书概述 / 117
- 第二节 书院藏书历史 / 122

第三节 书院藏书与儒学传承 / 125

第四节 书院藏书举隅 / 126

第五讲 佛寺藏书与道观藏书 / 135

第一节 佛寺藏书概述 / 135

第二节 佛寺藏书历史 / 138

第三节 佛寺藏书举隅 / 140

第四节 道观藏书概述 / 143

第五节 道观藏书历史 / 146

第六节 道观藏书举隅 / 148

第六讲 从古代藏书楼到近现代图书馆 / 151

第一节 从晚清藏书楼到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过渡 / 151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典籍归公与公藏发展 / 163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典籍归公 / 171

第四节 典籍归公的文化意义 / 181

第七讲 藏书制度及其技术方法 / 183

第一节 抄书、购书、换书与求书、刻书 / 183

第二节 分类典藏、版本校勘与书目、题跋 / 191

第三节 藏书处所的格局与藏本的装潢、修补 / 200

第八讲 藏书文化的继往与开来 / 209

第一节 中国藏书的文化特质及其人文内涵 / 209

第二节 中国藏书的历史性贡献及其文化影响 / 220

第三节 “书香家庭”的构建与中国藏书文化 / 229

后记 / 237

第一讲

中国藏书文化及其研究概述

“藏书”一词，最早见诸东汉班固编纂的《汉书》。在该书卷三十《艺文志》中有“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之句，记述的是汉孝武帝刘彻诏命建设皇家藏书之事。其效果，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所记：“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①

虽然中国藏书史源远流长，但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中，却没有专门词条对其作出诠释。《图书馆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也未设专条，仅收录《藏书纪事诗》《藏书纪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及藏书章、藏书票、皕宋楼、爰日精庐、八千卷楼等20余个与中国藏书史有关的一级词条。可见如何对“藏书”“藏书家”“藏书文化”做出符合其历史人文内涵的定义，乃是中国藏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

第一节 藏书、藏书家、藏书文化及中国藏书史

在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两种专科辞典，曾给予中国藏书史较大的篇幅，一是赵国璋、潘树广先生主编的《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是王余光、徐雁先生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者对“藏书”一词释义为：“指典籍图书的收藏活动。在历史中国，特指皇家、

^①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G]. 北京：中华书局，1982：2-4.